

2020

描述還是規範，政治還是倫理？——大疫當前的思考

**Descriptive or Normative, Political or Ethical?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Tongdong Bai
Fudan University, China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repository.hkbu.edu.hk/ijccpm>



Part of the [Applied Ethics Commons](#), and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ommons](#)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中外醫學哲學》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repository@hkbu.edu.hk.

描述還是規範，政治還是倫理？

——大疫當前的思考

Descriptive or Normative, Political or Ethical? ——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Challenges of the Pandemic

白彤東

Bai Tongdong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Ruiping Fan's paper, I argue that his attribution of the relative success of East Asian states in dealing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to Confucian culture is problematic in many respects. Some of his normative discussions based on Confucianism are too "thick" to

白彤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中國上海，郵編：200433。

Bai Tongdo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433.

《中外醫學哲學》XVIII:2 (2020年)：頁115-1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2 (2020), pp. 115-119.

© Copyright 2020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be universal. His defens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ethics in the age of science, especially the appeal to the concept of synchronicity, and the use of filial piety to reject herd immunity are questionable. I argue that a Confucian hybrid regime that embraces liberalism and combines democratic elements with meritocratic elements may lead to better decision-making and that the Confucian's New World System is a better alternative to globalization led by nation-states.

面對新冠疫情的挑戰，在〈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一文中，兼具倫理學者與儒家學者身份的范瑞平教授，提出了他的回應，展現了學者的現實擔當。我非常認同他這種理論上的努力，並且作為一個同情儒家乃至中國傳統的學者，我也很欣賞他的儒家情懷。但是，在這篇文章裡，我會以和而不同的君子精神要求自己，對他的論述提出一些不同看法，期待能夠引發我們進一步的思考和討論。

面對疫情，范教授指出：“東亞國家對於這次疫情的應對，至少在疫情明顯出現之後，總體上處理得較之西方國家更好，背後實有不同的倫理精神的反應和支撐。”范教授在這裡把東亞的成功歸於背後的倫理精神，尤其是儒家的倫理精神。但是，東亞諸國在何種意義上代表了儒家的倫理精神？傳統日本與傳統中國與朝鮮政體不同，哪怕是傳統中國，在政治上是儒法互補，在倫理生活上儒、道、佛兼用。二十世紀以來，經歷了變革乃至革命傳統的東亞諸國還保留了多少傳統，大可爭議。范教授指出：“儘管中國政府的總體指導思想早已不是儒家思想，但孝道的影響仍然存在於人們的行為和政策之中。”這似乎有想當然的成分。如果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東亞國家歸約於代表儒家倫理的國家，那麼儒家倫理對東亞的相對成功是否真的有貢獻？

並且，我們是否能夠把“西方國家”作為一個對比的整體？同為西方國家的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對疫情的應對，取得了與東亞國家類似的成功。既非東亞也非西方的泰國對疫情的應對也很成功。一般來講，作為規範理論學者，討論經驗問題，是很冒險的。

在規範層面，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的共同成功，可能意味著有不同的成功資源。那麼，它們之間共通的、可普世的資源是什麼？這種尋資源，更可能是范教授所批評的福山所“執著”的政治與制度，以及“薄”的、可化為政治安排的倫理考慮，而非范教授所解讀的儒家倫理學。後者是一套羅爾斯所講的“整全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如果我們接受自由社會的多元事實，整全學說就缺乏普世性。比如，范教授認為，儒家文明的核心是“推崇‘德’的天命倫理觀。”而孔孟都認為“上天已在每個人的心中注入了一定的德性。”這種天命之善性的理解，以及范教授後來所強調的所謂儒家的精氣感應學說，是否是孔子的主張，是否為所有儒家接受，都會有爭議。如果這些想法在儒家之間都不能統一，我們又怎能期待它們成為中國人、乃至全人類的普遍價值？反而是福山關心的政體類型、國家能力、社會信任和領導水準，更可以為擁有不同整全學說的人所分享。並且，政治與制度的安排，也比倫理的改進，能加有效。當然，我這裡不是否定倫理的意義。但是，為了普世性，倫理討論要盡量在“薄”的層面進行，這樣它討論的結果也可以迅速變成多元性社會裡面共同接受的政治安排，產生實際影響。比如，范教授指出：“家庭的實在結構反映了宇宙深層的實在結構，呈現在儒家的有些神秘的《易經》符號系統之中。”這種論述就只能被那些接受這套形上學的儒家學者接受。但是，我們完全可以說，通過家的延伸，儒家希望人類超越狹隘的個人，不做那些短視的決定。這就可以成為被不同信仰的人所接受，並可以成為制度建設的基礎。

范教授的一些倫理層面的討論，並不需要預設厚重的形上學，因此有普世的可能性。他對在現代科技的強勢下倫理地位的討論，所批評的是科學主義，而科學主義其實是對科學的迷信，恰恰是對科學精神的違背。真正具有科學精神的人，會對科學的確定性、全面性有著謙遜的態度，而不會認為整個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已經被因果性確定地解釋了。因此，范教授不應以因果性為

其批評對象。並且，在這一批評中，范教授提到了榮格的共時性 (synchronicity) 觀念。對量子力學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包立 (Wolfgang Pauli)，認為量子力學對因果性的挑戰與榮格的共時性觀念呼應。但同時，他也對榮格及其追隨者誤解科學提出了嚴厲批評。(白彤東 2019, 126-149) 范教授試圖利用共時性來解釋法格雷特 (Herbert Fingarette) 所談論的握手禮，認為握手雙方各自伸手的和諧不是因果性的結果，而是一種共時性的體現。但是，如包立應用共時性所解釋的量子糾纏 (entanglement) 所展示的，這種現象既不能用二者之間的因果聯繫來解釋，也不能用二者的共同原因 (common cause) 來解釋。握手雙方的和諧，是他們共用禮俗這一共同原因導致的結果，符合因果性。但如果一個英國人在清朝遭遇了一個中國女子，他伸出手來，清朝女子是不會和諧地伸出手來的。

在決策問題上，范教授說，儒家的孝道使得東亞國家不會接受群體免疫，因為後者會導致老人大量死亡。但是，在疫情肆虐的時候，醫生如果只能救活一個人，他應該選擇一個重病纏身、不能自理、只有半年壽命的老人，還是一個健康的嬰兒？僅僅訴諸孝道，是否也是范教授所反對的極端與激進主義的表現？除了孝道，儒家的生生原則在上述情況下如何照顧？

我也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與國際秩序的問題，在新冠疫情中被暴露出來。這裡，自由民主的自由部分（新聞自由、法治）是好的。如果中國大陸不是從人民到媒體都被封嘴的話，也許新冠可以被更早控制，至少全國人民可以上網發洩怨氣，不用擔心這麼大範圍的封號。但是，在我的新書裡 (Bai 2019)，我論證民主決策有結構性問題，其解決是將民主表達與儒家的精英決策結合的混合政體。在國際秩序上，范教授批評西方的契約傳統造成了國際上的不合作。但是，我認為，這裡真正的問題不是契約傳統，而是超越國家的全球化是由為了自己利益可以不顧一切的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主導這一悖論。對此，我也在我的

新著裡提出了以“仁責高於主權”為原則的儒家新天下體系。我想，上述在政治與制度層面上的努力，也許才是大疫當前，儒家能夠做出的貢獻。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白彤東：《實在的張力：EPR 論爭中的愛因斯坦、玻爾與泡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BAI Tongdong. *Tension of Reality: Einstein, Bohr, and Pauli in the EPR Debat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 范瑞平：〈大疫當前：訴諸儒家文明的倫理資源〉，《中外醫學哲學》，2020年，第XVIII卷，第2期，頁81-107。FAN Ruiping. “Combat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 Appeal to Confucian Ethic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XVIII: 2 (2020), pp. 81-107.
- Bai, Tongdong. *Against Political Equality: The Confucian Cas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